

2021 年第 7 期总第 47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1 年第 7 期·总第 47 期

国际财经

2022 年数字经济展望：数字时代的进化与突破-----	1
把脉世界经济八大趋势与十大变量-----	5
1970 年代的滞胀不太可能重演-----	8
“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的“难”与“解”-----	10

国内财经

北交所的“灵魂三问”：流动性如何？能否获得合理定价？有没有长期收益？-----	1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5
加强人民币升值情形下的汇率预期管理-----	20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24

新闻快讯

多项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金融标准发布-----	32
法媒报道：世界对中国集装箱“依赖程度惊人”-----	32
房地产税试点实施启动时间将由国务院确定-----	33
海外投资者长期看好中国经济-----	34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2022 年数字经济展望： 数字时代的进化与突破

来源：FT 中文网 (2021-11-12)

作者：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高欣弘 (工银国际金融科技分析师)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回顾 2021 年，我们认为有两个数字经济大事件值得重提与推敲：第一件事是 6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明确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表明数字经济日趋实体化；第二件事则是 10 月社交媒体企业 Facebook 改名 Meta，彻底转型为元宇宙公司，体现出虚拟现实“双循环”的进化思路。

沿循这两个数字经济的进化方向，数字监管正在成为平滑融合过程、扫除进化障碍的突破性力量。一方面，监管的适时补位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更加平和、稳定、有序、可控。另一方面，监管将重心放在行业集中度过高的电商和互联网媒体之上，也将鞭策企业主动寻求突破，由存量博弈转为增量挖掘。我们观察到，蕴含着未来预期的资本市场已用行动确证了上述逻辑，2021 年数字经济板块的股价表现开始与收入增速脱钩，符合进化方向与监管态势的行业才能赢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比如电商板块的营收增速相较 2020 年显著提升，但收益率表现却屈居末流，即使在屡创新高的美股前三季度收益率也仅为 1.5%（2020 年收益率为 78.6%）。

展望 2022 年，数字经济实体化与虚拟现实“双循环”的进化趋势将继续强化，相对应的，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将进一步聚焦：一是产业数字化向第一、二产业渗透，利好对农业、工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的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二是对数字商品的需求显著提升，利好涉及数字内容创建与确权的数字要素驱动业。

数字经济的进化：把握数字经济实体化与虚拟现实“双循环”的关键趋势。

2021 年，两大关乎数字经济进化方向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2021 年 6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以下简称《分类》），体现出数字经济日趋实体化。过去，数字经济总被视为一个宏大的概念性词汇，而缺乏与实体经济直接的对应关系，《分类》的出现标志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得以确认。《分类》中详细界定了数字经济分为五大类，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前四类是数字产业化部分，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而第五类则隶属于产业数字化，重点体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由于这一分类涵盖了与数字技术紧密相关的各种基本活动，因而它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通用标准的制定让数字经济的统计监管变得更为现实。

第二，2021 年 10 月，数字经济代表企业 Facebook 改名 Meta，则体现出数字经济的另一进化方

向：虚拟现实的“双循环”。Facebook 大刀阔斧地挥别昔日的社交媒体定位，率先彻底转型成一家元宇宙公司，而此后，微软等其他领先科技企业也开始宣布全面进军元宇宙。这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公司纷纷转型，意味着数字经济正在步入虚实相生的元宇宙时代。Meta 在希腊语的意思是 After 和 Beyond，由此我们认为元宇宙并非一个完全脱离于现实的理想乌托邦，而重在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传承与超越，它一边传承了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规律与情感变化，另一边它又将超脱于现实世界，提供挣脱物理空间与现实人生束缚的震撼体验，以此释放数字经济新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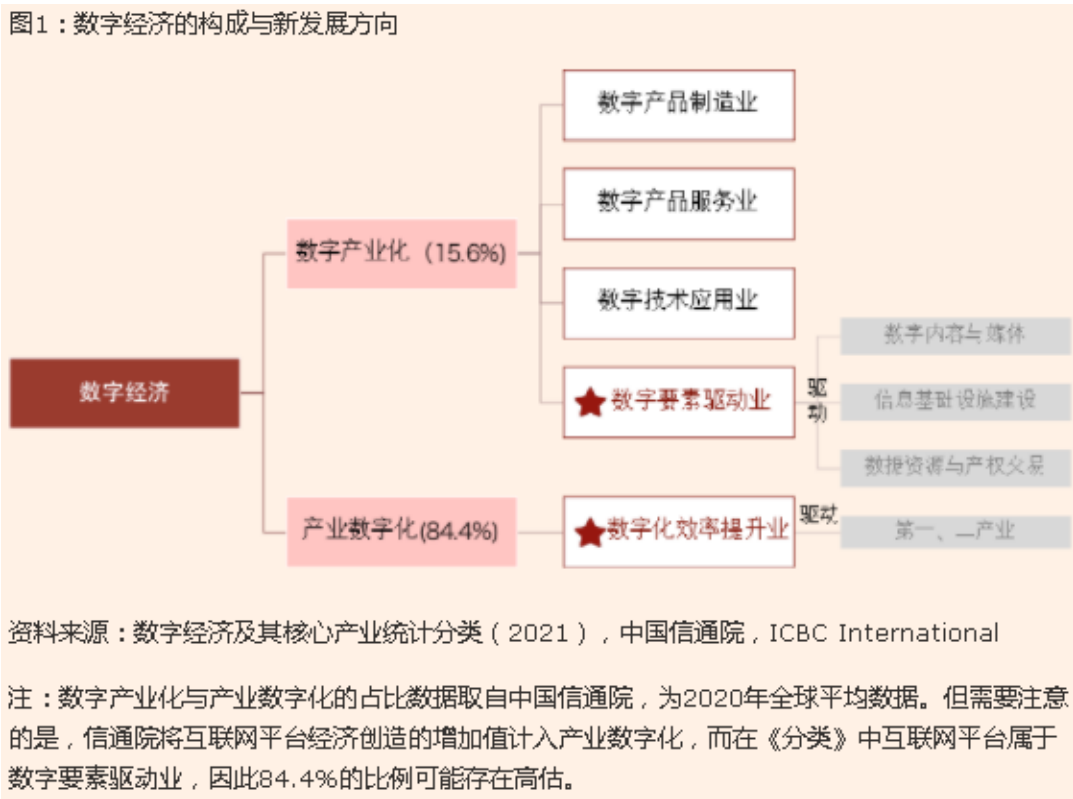
在数字经济进化的过程中，行业的板块红利也将随之迎来切换。过去数十年，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主导模式，通过优化供需匹配打开了经济增长的新路径。然而，如果仅是连接既有供需，而不挖掘新需求与改良供应链，那么随着供需匹配基本实现，平台经济难以创造出新的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虽然平台经济自身仍可以通过增加抽税的方式实现短期营收增长，但脱离经济贡献的成长可持续性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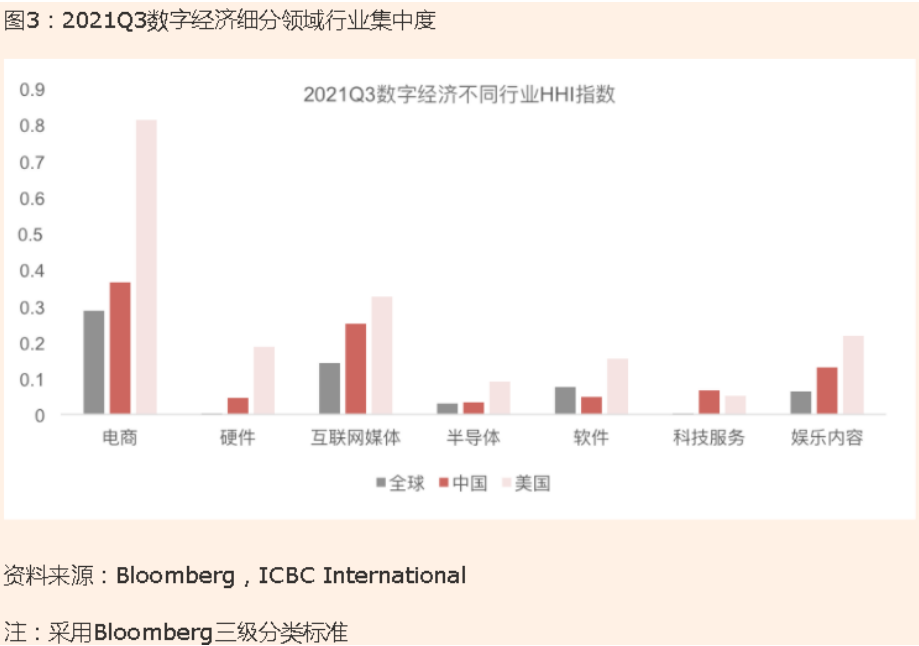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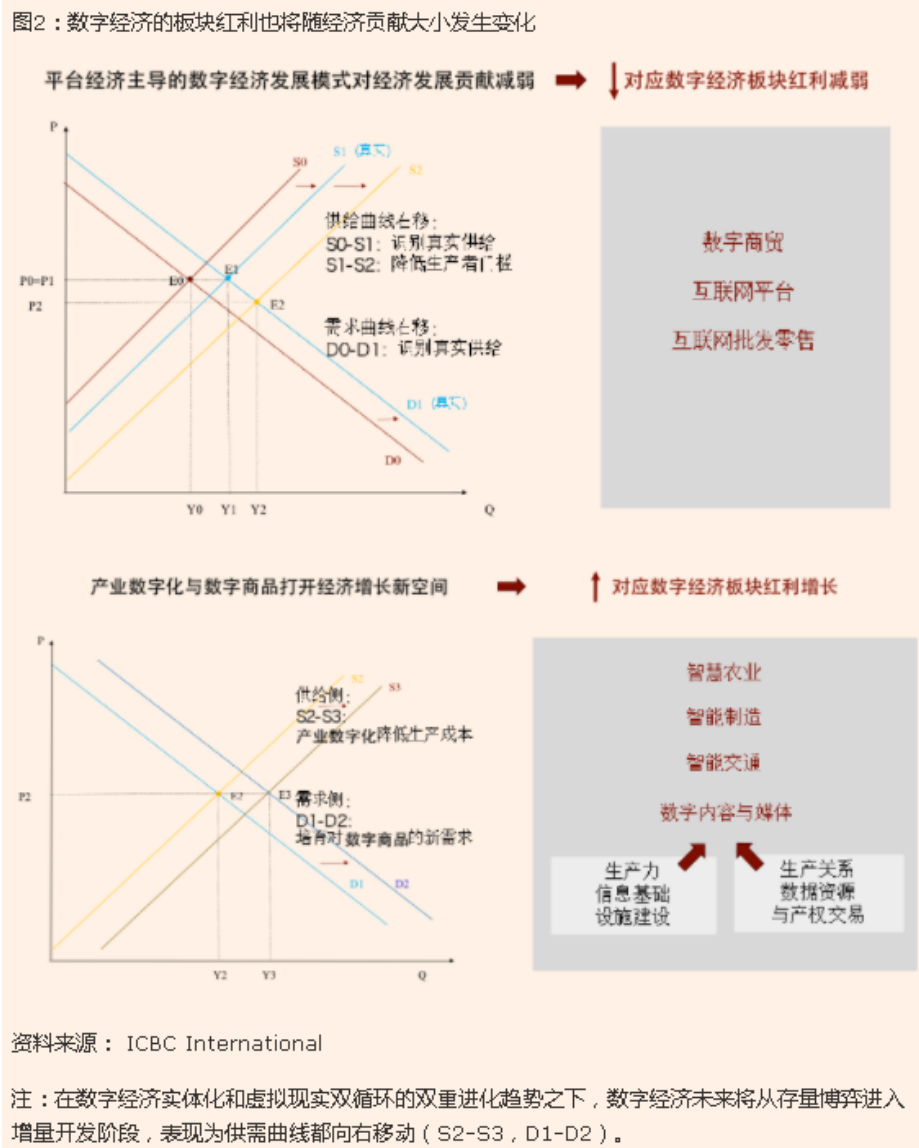
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供需模型，我们发现，若要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撑作用（均衡状态下社会总产量增加），最根本的还是要推动供需曲线向右移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重在创造新的需求，并加强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如图 2 所示）从供给侧看，数字经济的实体化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数字经济正向三二一产逐次渗透，随着 5G 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从搭建试点走向融合应用，2022 年数字经济向第二和第一产业的渗透率或将加速提升，发展红利有望向智慧农业、智慧工业和智慧交通等细分领域辐射。

从需求侧看，虚拟现实的“双循环”将打开数字商品的增长空间。目前可供消费的数字商品种类与数量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人们线上时间投入的增加和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内容与媒体的潜在市场空间值得期待。根据 Adroit Market Research 统计预测，当前全球所有虚拟商品的市场规模

大约为 500 亿美元，而到 2025 年保守估计将增长至 190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40%。

虽然数字商品并非首次出现，但元宇宙与 NFT 分别对应数字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升级，赋予了数字商品新的价值源泉。一方面，元宇宙通过再造一个虚拟平行世界，孕育出商业线上重做的广阔市场。另一方面，NFT 通过确认数字商品的产权与所有权，让原本支持无限复制的数字商品





具备了稀缺性。日前，从一线奢侈品品牌 LV、Burberry 到大众消费品牌可口可乐，各大公司接连试水 NFT，推出自身产品的数字版。Gucci 的虚拟酒神包与实物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的现象，虽然其中存在炒作的因素，但元宇宙的市场潜力的确不容小觑。

由此，我们的核心判断是，2022 年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将聚焦于数字要素驱动业与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中，数字要素驱动业的投资机会将诞生于数字内容与媒体，一方面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内容的创建提供了生产力的技术保证，另一方面数据资源与产权交易则为数字内容的交换与变现塑造了有序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共振将孕育出数字内容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中，由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业态的融合已经相对成熟，数字技术对农业、工业的全方位和全链条改造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数字监管的突破：在平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过程之余，以“有形之手”扫除数字经济的进化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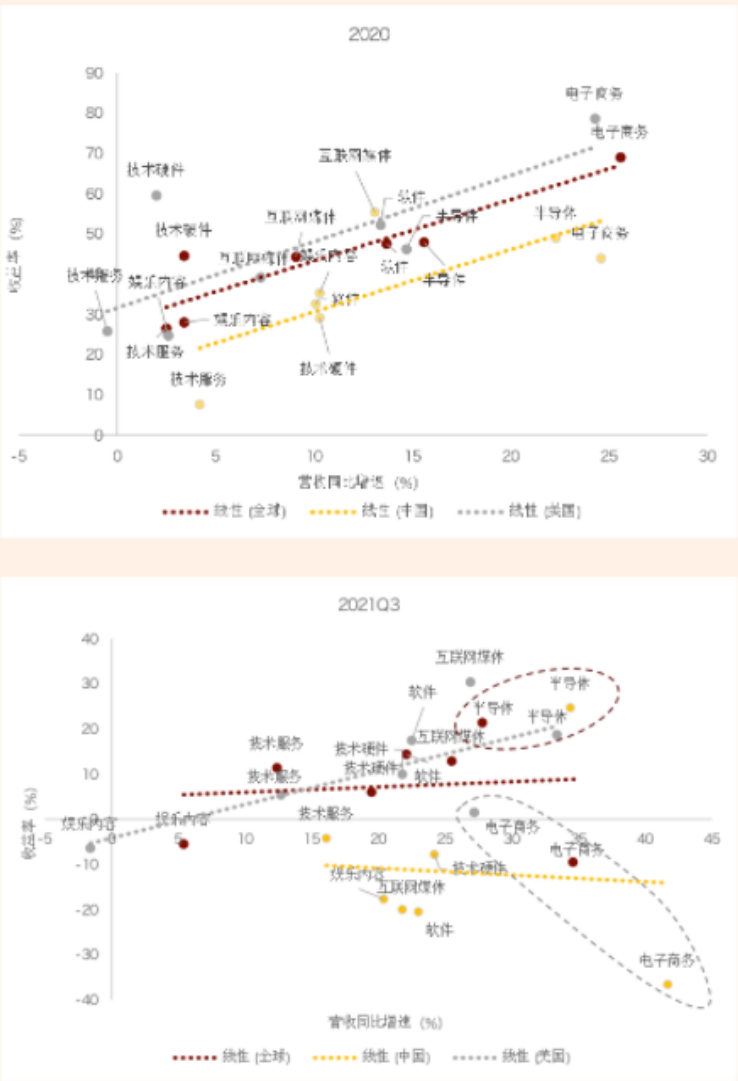
不可避免地，数字经济整体的进化和升级

伴随着微观个体的阵痛。当前市值排名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都曾经历过跑马圈地的“烧钱”阶段，而现在转型至下一阶段却需要它们放弃积累多年的流量与数据优势。

我们认为，数字监管就是降低摩擦成本、助力企业突破的关键要素。第一，监管的补位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过程更平和、稳定、有序、可控。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系统重要性日益提升，根据信通院计算，2020 年全球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43.7%。因此，数字经济需要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在与时俱进的监管体系内以全面规范的姿态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第二，监管还将以“有形之手”扫除数字经济进化的障碍，加速互联网生态的进化。数字技术在对经济发展形成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平台经济、数据隐私和数字货币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2021 年，针对科技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反垄断的本质并不是打压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是以“有形之手”矫正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均衡，推动数字经济生态进化与健康发展。一方面，行业集中度过高会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司可能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图 4：2021 年资本市场印证了数字经济发展逻辑的变化



资料来源：Bloomberg，ICBC International

注：采用Bloomberg三级分类标准，收益率与营收同比增速数据均截至2021Q3，收益率为2021年前三季度收益率，营收同比增速采用过去12月的营收增速。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如果数据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还会加剧对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我们对数字经济不同子版块（彭博行业三级分类）的行业集中度（以HHI指数为衡量标准）进行了测算。如图3所示，在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行业集中度最高，互联网媒体与数字娱乐内容次之，软件、硬件以及技术服务则处于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之中，美国数字经济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整体高于中国。其中，美国的电商领域基本由亚马逊单一公司垄断（市场占有率超过90%），而中国则呈现“寡头化”趋势，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瓜分市场份额。这也展示出监管帮助数字经济打破桎梏的具体过程，当前监管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行业集中度高的电商、互联网媒体等数字经济上半场的发力点，预计企业或将在监管的鞭策下主动寻求突破，重点挖掘数字经济的增量市场。

金融市场的确证：股价表现开始与收入增速脱钩，符合进化方向与监管态势的行业才能赢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资本市场作为对未来预期的提前反映，已经在2021年确证了上述趋势。经我们统计发现，2020年数

数字经济各板块的股价表现与基本面存在直接的正相关性，而 2021 年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截止 2021Q3，除了美国公司的股价表现整体上仍然与营收同比增速正相关，全球以及中国的股价表现开始与收入增长的速度脱钩（如图 4 所示）。进入后疫情时代，虽然中国的数字经济各产业的营收同比增速均表现良好，但整体估值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行。

全球视角下，2020 年和 2021 年电商在资本市场的表现经历了冰火两重天。2020 年，线上消费的同比增长部分缓释了经济停摆的压力，电商版块的投资表现与其基本面基本保持一致，美国电商企业的年收益率甚至达到了 78.6%。而在 2021 年，受一二季度的低基数效应影响，电商的营收增速显著高于 2020 年（全球 34.6%vs25.6%，中国 41.7%vs24.6%，美国 27.2%vs24.3%），但其在股价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年初至今中国电商版块的市值下跌了 36.6%，全球下跌 9.5%，即使是屡创新高的美股收益率也仅为 1.5%。我们认为，这反映出在经济转型与监管趋严态势下，投资者对电商业务后续扩张空间的担忧。值得关注的是，不论中美，半导体的收益率表现均与其实际的业务增长表现吻合，佐证了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重心需要向硬核科技转移，重大技术突破与关键环节竞争力方是长久的立足点。

把脉世界经济八大趋势与十大变量

来源：爱思想网(2021-11-01)

作者：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0 月 23 日，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以及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第六届中华复兴论坛：世界变局与中国”在线上成功召开。

以下是陈文玲在第六届中华复兴论坛上的发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瘟疫。这两个“百年”交融在一起，使世界疫情前的存量问题和疫情之后的增量问题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导致的大变局叠加，个中风险陡然上升。当前世界经济可能由此将发生八方面重大的变化，而未来影响世界经济的变量主要表现为十方面。

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八大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会划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疫情是改变世界力量、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联系的一次突发性事件，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疫情前和疫情后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可能就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比如面临的公共卫生的风险陡然上升，现在全球 2.4 亿多人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接近 500 万人，而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将来不仅要和新冠疫情这样的病毒做斗争，还有未来看不见的病毒、公共卫生灾难、恶性传染病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生命健康的问题，将首先对当前继而未来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第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不稳定性陡然增加。去年全球经济负增长 3.3%，美国负增长 3.5%，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正增长的经济体增长仅为正 2.3%。今年年初，IMF、世界银行、OECD 等机构的预测都很乐观，而且对美国的预测是最乐观的，达到了 6.5%的增幅，是五十年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但是一旦出现一些例如经济问题、疫情问题、阿富汗撤军问题等，经济增长马上就会应声下调。现在美联储预测是最悲观的，已把美国的经济增速调到 5%以下。亚特兰大联储等于美国三季度预测甚至 0.2%，所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也不稳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更不稳定。

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美元升值贬值、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紧缩的影响。流动性泛滥时，它们是受害者，流动性紧缩时，它们是被收割者。所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会陡然增加。

第三，通胀风险和通缩风险会交替产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胀风险，但是这种通胀风险是流动性泛滥引起的。美联储已经发出明确信号，到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收缩，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PPI 价格下降会向 CPI 还会传递，进而导致下一轮的通缩。所以通胀通缩会交替进行。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第四，债务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大。2021 年全球债务《简要分析 2021 全球债务和美国经济动态》2021 年 IIF 数据指出，2020 年全球债务新增 24 万亿美元，累计达到 281 万亿美元。预计到 2021 年底，全球政府债务或将达到 92 万亿美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现在是负利率、低利率、零利率。全球国债收益率继续增长，据去年统计，全球负收益率的国债总额已达 19 万亿美元。这 19 万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包括 10 年期、30 年期、5 年期在许多国家都是负利率，个别国家是零利率。负利率、零利率，低收益率和负收益率的长期国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给世界经济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前一些国家可以用发债透支未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在解决国际性的难题，利用超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不仅是指美国，也包括欧盟、日本、中国等。中国现在的债务虽然总体可控，尤其是政府债务在 60% 的警戒线以下，但是企业债、个人债、地方债也在上升，一些企业长期高负债运行，抗风险能力脆弱，所以金融风险、债务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第五，供应链断链的风险。供应链重组的风险和供应链再链接会交替进行。供应链断链有两重因素。一个是疫情导致的自然熔断，另一个是一些国家政客推动的人为阻断。拜登今年以来在白宫开了三次会，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进行供应链重构，我觉得有点异想天开。世界供应链并不是按价值观组成的，是跨国的市场需求关系，是需求和供给相互匹配的结果，是自然形成的长期互相匹配的过程，而不是靠政府力量形成的。

现在全球供应链的断链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美国政客推动重构供应链，有意遏制打压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力图重构以美国为主体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基础是要有强大的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仅增加值占 GDP 的 10.8%，虽然它具有原始研发和高端产业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但是供应链的主体已经不在美国了，供应链东移是肯定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中，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当前一定占有最大的优势。但是我们缺乏高端顶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基础研究、原创研究和颠覆性、基础性、共性的技术。近期供应链混乱下美国港口积压了大量集装箱，甚至连圣诞节的商品供应都会出问题，但这还只是贸易再链接层面的问题。全球经济未来最大的链接是供应链的再链接。例如，中国产业配套能力这么强大，重构一个制造业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有产业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转移，但是这些进行转移的跨国公司包括一些中国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的是“1+N”战略，即制造业的主体部分留在中国，加工制造、工厂车间等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这或许是未来供应链改变的主要趋势，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六，金融风险与金融重构。在疫情前，因为美元美债的发行，在全球流通还比较畅通，世界的认可度还比较高，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直占 62% 以上，在结算货币中占 40% 以上。全球金融主要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和准国际货币的体系，结构性矛盾还不突出。据 IMF 的数据，2021 年一季度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已经下降到 59.6%，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结算货币占 40.4%，最低降到 38%，已低于欧元占比。原来国际大循环使美元美债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准国际货币，虽然已经没有实物支撑，没有和黄金挂钩，但是世界认可就是硬通货。然而现在美国的国际大循环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美元美债的霸权主义，使世界对美元望而生畏，对美债不敢恭维。现在拜登政府借债美国累计国债已经达到 28.7 万亿。经过美国财政部长几轮力争，美国国会同意将最后期限延长到 2021 年

12 月 3 日，债务上限是 28.88 万亿，到 12 月 3 日肯定会突破这个数字。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到 2016 年，美联储连续四次放水，总计金额达 3.8 万亿美元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也接连放水，这会一直放到美国国债超过 40 万亿。当然经国会批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放水借贷是现在美国绕不过去的坎。美国除了外循环、国际化的大循环出现问题，内循环其实也出现了问题。美国国债原来是靠美国的机构和居民购买，现在美国的居民购买率、机构购买率都在下降，60%以上新增国债由美联储回购，所以产生了真正的“内循环”。耶伦多次呼吁要放宽上限，采取政策，和中国合作，取消特朗普加征的高额关税等。这说明美元美债的信用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会有一些变革。人民币比重虽然上升比较缓慢，但是它的信用、地位、影响力在提升。欧元在国际结算货币中比重在一些时段已经超过美国。全球 80 个央行已经有 20%以上的在试验数字货币，60%以上的在研究数字货币。所以，国际金融由于货币体系的调整 and 美元的升降起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第七，世界经济将会面临极端气候风险的挑战。极端气候会越来越多。最近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在 2040 年前，非洲高山山顶的雪全部都会融化。目前格陵兰岛的雪大面积融化；喜马拉雅山雪线下降；加拿大、美国遭遇高温天气；欧洲、南美洲、东南亚、南亚包括中国等都遭受了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极端气候下经济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本次的拉闸限电使三季度 GDP 从上半年平均 12.71%一下降到 4.9%。这与煤炭价格上涨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还有极端天气和汛情等其他因素影响。所以，极端气候对世界经济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第八，当前能源风险主要来自人为因素。能源本无风险，据国际能源署对未来的能源预测，到 2040 年，世界对能源的年均增长率是 0.6%，不到 1%，大大低于 GDP 的增长幅度。但是现在出现了能源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天然气价格上涨接近十倍，石油、煤炭价格都大幅度上涨，因而导致煤荒、气荒、油荒、电荒。这种人为导致的能源危机和未来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交织，总趋势供大于求与能源过剩的情况将交替进行。本来在能源供求关系总趋势下，能源价格应该是平稳下行，保持在恒定的成本加利润的幅度。现在价格大幅度跌宕起伏的问题背后，实际上就有美元的力量，还有能源生产国的力量。比如限产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扩大生产规模，价格就一定回落。疫情背景下，运力的价格飞涨，一旦经济阻滞，虽然进出口商品没变，但是价格一定会上涨。所以疫情前后，经济上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一些调整。

二、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主要变量表现在十个方面

从世界变局来看，我认为主要会受十大变量的影响。

第一个变量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变量，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新中国 70 多年努力，改革开放 40 多年快速增长，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体人民脱离了贫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在走向强起来。通过此次疫情，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地位、作用、国家影响力在持续上升，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中国的自信心在不断上升。

第二个变量是美国趋向走下坡路。美国国内矛盾复杂各类问题交织在一起。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就要走到下坡路，现在是衰落的拐点。我认为是衰落的开始，是始点，而不是拐点。美国仍将是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军事大国、第一技术大国，其原始创新能力还远在我们之上。即使中国在 2030 年左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彼时我们的人均 GDP 仍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现在美国仍然占据了尖端创新的高地，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变量，其经济上特别是货币政策美元的调整，科技政策上是否能把更多的科技成果与全世界共享，这对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三个变量是大国之间竞争与角力加剧。现在世界真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已经形成若干大三角关系，包括中美俄、中美欧、美欧俄等，还有若干个四角关系、菱形关系、弧形关系等等。大国的竞

争博弈在加剧，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虽然美国重构盟友体系，但是其盟友绝不会像冷战时期绝对的选边站队，而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下不断进行新的排列组合，这增加了国际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四个变量是东升西降和南北关系的调整；第五个变量是科技革命加速；第六个变量是产业变革加速，这实际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七个变量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第八个变量是全球治理体系、标准规则与运行方式的变革；第九个变量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供给需求关系继续调整；第十个变量是全球价值观与文明冲突、激荡与交融。

总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也处在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最后 30 年的冲刺阶段。这既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也是迈向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阶段，能不能冲破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遏制、打压、围堵，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定力，特别是考验我们在战略上不犯错误的能力。中国只要稳步的向前，不犯颠覆性战略性错误，不出现把自己搞垮的事情，中国就是战无不胜的。

1970 年代的滞胀不太可能重演

来源：FT 中文网 (2021-11-10)

作者：陈敏兰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以迪斯科音乐以及社会运动频仍为标志的时代，也是经济剧变、市场动荡的时期。由于滞胀来袭，经济增长急剧下滑，失业率飙升。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能源价格飞涨，原油价格从 1970 年的每桶 3 美元猛升至 1974 年的 12 美元。

近 50 年过去了，“滞胀”一词又重回人们视线。大宗商品价格急升，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导致商品成本畸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放缓——似乎与 1970 年代相仿。许多人开始担忧全球经济将再度陷入滞胀泥潭。

然而，不确定性虽可能挥之不去，但这远非重返 1970 年代——如今的全球经济形势与那时截然不同。最明显的是，当前的供应瓶颈并非永久性而且终将消退，中央银行控制高通胀的能力也已大幅改善。

投资者当然应以史为鉴，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认为通胀可控并维持偏好风险的立场。

滞胀不太可能重演

1970 年代的能源危机无疑是引发滞胀的主要原因。中东石油禁运导致原油价格飙升，也带动其他所有商品价格上涨。而如今的能源短缺现象与那时极为不同。

随着经济从疫情封锁中复苏，工业需求逐渐回暖，而供应仍受到掣肘，例如天气原因造成的生产中断、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体系融合的挑战以及供应链瓶颈等。这使得化石燃料价格创记录新高或涨至多年高点。但我们认为，随着欧佩克及其盟友（OPEC+）以及美国的石油产量增加，加之库存恢复，能源价格将会企稳（尽管可能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我们对今年 12 月以及明年 3 月布伦特油价的预测均为 90 美元/桶，随后在 2022 年余下时间将回稳于 85 美元/桶。

此外，自 1990 年以来，全球 GDP 能耗强度下降了 25%，自 1970 年代初更是大幅下降逾 50%。我们估计，未来 30 年能源需求将增长 25% - 30%，这比 1990 至 2020 年期间 63% 的增速大为降低。向绿

色能源转型受挫可能会令化石燃料需求增长，但这种情况应该为时短暂。

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也助推了 1970 年代的滞胀。各国政府试图通过管控工资和物价来遏制通胀，而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当时工会的影响力比现在要大很多，在进行工资谈判时，工会常常把生活成本上升也纳入谈判，从而使高通胀传导至工资增长，进而导致通胀进一步上升。

这些因素叠加大幅推升了 1970 年代的通胀，而如今这些因素都不复存在。美国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值得关注，但当前劳动力供应短缺的现象以及低技能岗位和服务业工资上涨的压力，只是劳动力重回职场过程中的暂时摩擦。随着后疫情时代劳动力短缺问题得以解决，这种压力也将缓和。

经济和盈利前景依然强劲

总体而言，滞胀忧虑以及对央行大幅收紧政策的预期似乎有些过度。美联储很快将宣布缩减购债规模，但加息似乎还有一段时间。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在 1.6%，2021 年底前可能将升至 1.8%，至 2022 年底进一步升至 2.2%。不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核心决策层仍倾向于保持“耐心”且不太在意目前面临的挑战。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在 2021 年第三季度均有所放缓，但整体环境依然稳健。鉴于去年同期经济迅猛反弹，因此从高位回落也并不意外。如前所述，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些不利因素（比如供应链瓶颈和能源价格高企），应会在明年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我们预计标普 500 指数 2021 年和 2022 年的每股收益将分别增长 45% 和 10%。从全球来看，我们预计今明两年每股收益将分别增长 43% 和 9%。我们预计 2021 年亚洲总体盈利增速为 29%，2022 年为 10%。这为全球和区域股市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上涨带来支持。

布局于增长领域

从战术上而言，我们依然看好受益于经济重启的行业和市场。能源板块是油价上涨的直接受益者，而能源股价格只计入了长期布伦特油价在 55-60 美元/桶的预期，远低于目前原油现货价格 85 美元/桶。与此同时，金融公司的盈利表现大幅超预期，随着全球货币刺激力度减弱，净息差上升应会带来提振。

欧元区和日本也是我们看好的两个市场。明年欧元区 GDP 增长料将加速至 5.3%，高于今年的 5.1%，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们预期经济增长将加速的地区之一。由于欧元区股市的行业构成更具周期性，因此将受益于目前的诸多利好趋势，而且多年持续表现欠佳后投资者的欧股仓位也较轻。日本股票应受益于经济重启以及新任首相治下财政支出加大，这些正面因素尚未反映在股价中。

在亚洲其他国家，东南亚、韩国和日本政府的抗疫策略逐渐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这为该地区与经济重启相关的行业带来利好。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稳增长与推进结构性调整之间取得平衡，中国股票的最差时期可能也已过去。

从战略配置角度，我们看好全球医疗保健和绿色科技板块。医疗保健行业兼具增长潜力和防御性特质，且拖累股价的不确定因素预计将在 2022 年消退。我们也看好绿色科技板块，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不会阻碍进一步投资，反而会促进投资提速。我们认为，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和数字化、电气化和电池、生物能以及绿色融资领域蕴含投资机会。

“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的“难”与“解”

来源：人大重阳网(2021-10-28)

作者：朱青(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获通过意味着什么

2021 年 10 月 8 日，G20/OECD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 140 个成员中的 136 个成员再次发表声明（以下简称“新声明”），正式就新的国际税收规则（“双支柱”方案）中的重要参数达成一致，这是继 2021 年 7 月 1 日包容性框架 130 个成员宣布就新的国际税收规则达成共识后，国际社会在有效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方面取得的又一具体进展。

国际税收规则的改革是在经济数字化大背景下展开的，事关各国的国家主权和税收利益，目前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一路走来其过程并不顺利，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分歧，甚至发达国家中，美、欧之间也意见相左。

“双支柱”国际税收新规则的通过，标志着这项从 2017 年就已启动并由包容性框架（目前由 140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进行研究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应当说，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避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服务税“战争”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税收将面临哪些新规则

从“双支柱”税改方案来看，支柱一主要解决的是征税权的重新划分，即如何让大型跨国公司“吐出”一部分剩余利润分配给市场国（含用户所在国，下同）以供其征税。支柱一由金额 A、金额 B 和税收确定性三部分组成，其中金额 A 是核心内容。新规则要求跨国企业即使不在市场国设立任何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也要将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以金额 A 的形式分配给市场国。适用范围是年度全球营业收入超过 200 亿欧元，同时税前销售利润率在 10%以上的跨国企业（采掘业和受监管的金融服务不包括在内）。未来如果进展顺利，营业收入的门槛将降为 100 亿欧元。10 月 8 日的“新声明”在 7 月份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适用范围内的跨国企业要拿出营业收入 10%以上部分（剩余利润）的 25%分配给拥有联结度的市场国。

金额 B 是对分销机构从事的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设定固定的回报率，使相关报酬标准化，以简化独立交易原则的运用。目前该部分的具体方案还在研究之中。

支柱二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公司所得税的最低有效税率。7 月份的声明强调这个最低有效税率至少在 15%，而“新声明”将其锁定在 15%。全球最低有效税率是通过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和应税规则（STTR）来实现的，而前者又包括所得纳入规则（IIR）和低税支付规则（UTPR）。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设置了经济实质排除，即将相当于有形资产账面价值和人员工资总额 5%的所得额排除在规则之外，7 月份声明要求有 5 年的过渡期，其间的排除比例至少为 7.5%。但“新声明”将过渡期延长到 10 年，并引入了所得排除规模的递减模式：即从有形资产现值的 8%和工资总额的 10%起步，前 5 年排除比例每年减少 0.2 个百分点，后 5 年有形资产每年减少 0.4 个百分点、工资总额每年减少 0.8 个百分点。

为了扶持企业走向国际化，“新声明”还增加了一条：“处于国际化活动初始阶段的跨国企业可免于适用低税支付规则，这类跨国企业是指海外有形资产不超过 5000 万欧元，而且在不超过 5 个海外管辖区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另外，“新声明”中应税规则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的最低税率确定为 9%，而 7 月份的声明表述的是 7.5%~9%。

三、方案通过展现了怎样的利益博弈

最终方案应是各方相互妥协、各取所需的结果。目前，跨国公司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据统计，世界各国因利润转移到国际避税地每年损失的税收收入高达 4270 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 1/5 以上，大约为 900 亿美元。

美国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1 月上任后不久，就提出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为了筹资，拜登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增税计划。同时担心，一旦对公司增税会引发美国企业外迁或公司倒置，并进一步加剧利润向低税国转移。现在，在公司所得税改革浪潮中，正常税制国家名义税率也因税率“逐底竞争”而越降越低，例如 OECD 成员国的平均税率已从 2000 年的 32.2% 降到了 2020 年的 23.3%。面对这种外部环境，美国要做到公司所得税增税，必须有一个全球最低税作为“防护墙”，以确保美国公司的资本和利润无处可逃。

其实，美国一开始对支柱一态度抵触，特别是其中的金额 A，认为这是对美国数字化大公司的歧视，但为了解决数字服务税引发的贸易战，推进构建全球最低税制度，美国只能同意支柱一。最终金额 A 适用范围将经营规模大、利润率高的跨国企业都囊括了进来，并不只限于数字化企业。

许多欧洲国家由于数字经济相对落后，所以其关切点在新经济形态下税收利益的分配问题，或者说它们更看重支柱一，尤其是其中的金额 A。况且，欧洲主要国家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并不低，所以实行 15% 的全球最低税并没有损害其税收权益。

四、最终方案是否让各方都满意

既然包容性框架 140 个成员中有 136 个签署了协议，说明各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应该说是求得了国际税改的最大公约数。

15% 的最低税率对欧盟高税国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却引起欧盟低税国如爱尔兰和匈牙利的强烈反对。因此“新声明”中的最终方案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将最低税率定为 15% 而不是更高，这与拜登政府最初甚至提出 21% 的最低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匈牙利等国获得了较长的经济实质排除期，仍可在方案实施后的 10 年内对其辖区内的有形投资提供低税率优惠。当然，爱尔兰和匈牙利等欧盟国家最终同意签署协议与欧盟内部的协调和力求一致行动也不无关系。

发展中国家真正实行低税政策的并不多，其中很多也是跨国逃避税的受害者，为了让“双支柱”改革方案顺利通过，以及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税收环境，这次也都基本赞成 15% 的全球最低税。

此外，方案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发展中经济体采用一种被称为“选择性约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金额 A 有关事项的争议，即只有在当事国主管税务当局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约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说，这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包容性框架的谈判中努力争取的结果。

五、“双支柱”方案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国际税收规则的改变肯定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看来，对我国企业总体影响面不大。从支柱一的角度看，我国企业中同时符合方案规定的营业额和利润率标准的并不多，但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它们既符合协议规定的营业额和利润率标准，也有一定规模的海外收入，一旦改革方案落地，每年就要拿出一定的利润分配给市场国。

从支柱二的角度看，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对我国企业的影响也不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 25%，但也有一小部分企业因同时享受多项行业和鼓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实际税负较低，根据支柱二中的低税支付规则可能要由国外对其一部分国内低税利润进行补税，但随着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这种情况也不会是常态。另外，为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抵免法，对居民企业从

境外取得的利润或股息、红利按照我国的税率补税，支柱二中的收入纳入规则对我国企业来说意义不大。同时，我国对居民企业从境外取得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投资所得一般也要按 25% 的税率办理税收抵免。

因此，全球最低税改革方案从本质上说与我国的税制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我国作为包容性框架的成员支持这项改革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六、方案如何发挥作用和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包容性框架发表的声明，支柱一中金额 A 的多边公约将在 2022 年完成开发并开放签署，在 2023 年生效执行；金额 B 的具体实施方案将在 2022 年年底发布。而支柱二应在 2022 年立法，2023 年开始实施，其中低税支付规则将于 2024 年开始实施。接下来，各成员方要完成多边公约的签署，并对本国的税法做出相应的修改。为了便于各管辖区以一致的方式实施规则，包容性框架将开发国内立法模板，便于各管辖区按照统一标准完成国内税法的修订工作。

国内财经

北交所的“灵魂三问”：流动性如何？ 能否获得合理定价？有没有长期收益？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21-10-20)

作者：张奥平 (增量研究院院长、增量资本创始人)

自从 9 月 2 日北交所宣布设立后，各地方政府、企业、投资机构、中介机构都在为抓住此次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改革机遇，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例如，地方政府端：近期潍坊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加快上市的若干政策》，对拟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分阶段给予每家企业总额 1400 万元补助；资金端：证监会网站近期显示，南方基金、广发基金、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嘉实基金、大成基金、万家基金 8 家基金公司，已申报了以“北交所”命名的主题基金（简称“北交所基金”）；申万宏源证券将设立 100 亿元一级市场股权基金，用于投资“专精特新”企业；设立 100 亿元二级市场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为对北交所创新型中小企业感兴趣的投资者提供财富管理服务；投入不少于 10 亿元资金，用于北交所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做市等。

资产端：宣布设立北交所至今，已有 12 只精选层新股启动公开发行，从已公布结果的 8 只新股发行情况来看，投资者申购踊跃，平均打新户数约 18 万户，平均网上发行中签率 0.92%。

北交所开市脚步渐行渐进，我们在市场一线和企业家、投资人交流时，明显感觉到市场各方主体皆对参与北交所充满了热情与期待。但是北交所是否具备长期价值机遇？还是仅是一次短期市场的投机博弈？

我们回归到最本质来看，任何资本市场本质的两大核心功能：1、帮助优秀的企业实现融资发展；2、让市场中的投资者实现资产配置效益与效率的最大化。而再往下思考一层便是：市场能否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一端吸引优秀的企业，另一端吸引长期价值型资金。市场是否能具备充裕的流动性，

从而给到优秀企业合理的定价市值，从而使得优秀企业可以实现持续的融资发展，投资人可以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所以，北交所是否具备长期价值机遇，背后的三大核心问题：第一，北交所未来的流动性将如何？第二，优秀的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后能否获得合理的定价市值？第三，北交所是否能给到投资者长期收益？

一、北交所未来的流动性将如何

一个资本市场是否能具备充足流动性的第一大核心是投资者参与交易的门槛。此前新三板市场，便是因投资者门槛过高，使得整个市场丧失了流动性。目前，北交所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为“50 万元+2 年”，与科创板齐平。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是北交所在 9 月 17 日直接发布试行，并没有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直接明确个人投资者准入的资金门槛为证券资产 50 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不设置资金门槛。不像 9 月 5 日发布的首批其他业务规则一样，如上市规则、交易规则等，发布后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可见，深化新三板改革而来的北交所，对于投资者门槛的设计已经做了充分的评估与准备。

此外，资本市场是否能具备充足流动性的第二大核心便是市场中是否有充足的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理性价值投资资金，引导市场。证监会网站近期显示，南方基金、广发基金、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嘉实基金、大成基金、万家基金 8 家基金公司，已申报了以“北交所”命名的主题基金（简称“北交所基金”）；申万宏源证券将设立 100 亿元二级市场公募基金投资北交所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可见北交所已经彻底改变了此前新三板市场在二级市场资金端的颓势。

但是，在资金端仅有二级市场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的资本市场也是不完善的，企业发展、实现融资需要从上市前便有相应的资金匹配，助力其成长。所以，在北交所上市前的一级市场（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也需要股权投资机构参与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来北交所上市。从目前的市场消息来看，创投机构也正在积极备战北交所。

根据我们增量研究院调研的近 50 家创投机构反馈情况来看，目前多家创投机构以及有限合伙人（LP）普遍看好北交所的设立和上市企业的前景。表示：北交所指明了 PE/VC 的投资方向，也就是着眼于专业化、有特色的精细化的中小企业，提升了创新资本“投早投小”的信心。

这背后的本质逻辑也十分简单，投资机构的商业模式链条是“募投管退”，北交所将企业在 A 股实现 IPO 资本化的门槛从最低的科创板 10 亿市值，降低为 2 亿市值，大幅缩短了投资机构实现收益，从而资金退出的时间，提高了投资的整体效率。

所以，从目前北交所市场的制度设计以及市场资金端的及时反应来看，北交所在流动性方面将和此前新三板市场大有不同，流动性将会有有一个明显的质的提升。

二、优秀的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后能否获得合理的定价与市值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只要是优秀的企业在任何市场都可以拥有合理的市值。例如，早在 2018 年，当时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新三板挂牌公司神舟优车市值曾达到 400 亿人民币以上。今年更是有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贝特瑞市值突破 700 亿元人民币，新三板精选层达到百亿市值以上的企业也有十余家。

所以，只要是优秀的企业在任何市场都会有合理的市值，而若不是优秀的企业，在目前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大趋势下，在任何市场都会缺乏资金关注，从而丧失市值。

其次，企业能否有合理的定价与市值，重点看市场是否具备充足的流动性。在上文讲到北交所的

流动性将会有个质的提升，一个流动性充足的市场，企业必然可以获得合理的定价与市值。

数据显示，目前精选层股票平均市盈率为 35 倍左右。而创业板、科创板股票平均市盈率分别约为 40 倍、50 倍。但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市盈率仍是按照精选层 100 万投资者门槛交易出来的，当北交所正式开市，投资者门槛降至 50 万后，市盈率必然会有所提升。

此外，市盈率的本质是企业价值持续增长的预期。北交所重点服务的便是处在“更早、更小、更新”具备高增长能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们具备更充足的成长性与发展的活力。可预计，伴随着北交所市场的平稳发展，一个拥有更多高增长型企业的资本市场，将会吸引更多价值型资金进入，最终也将给予企业更为合理的定价与市值。

三、北交所是否能给到投资者长期收益

关于投资者能否在北交所获得长期收益，这个问题从本质上看，是看市场是否能够持续吸引到优秀的企业，清理掉相对劣质的企业，并且留下相对优秀的企业。所以，关于北交所的核心的三大问题：流动性、市值（本质是能否吸引到优秀的企业），以及资金端的收益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

从中国资本市场整体投资端来看，与海外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最大的区别便是牛短熊长，市场投资者“炒小、炒差、炒新、炒壳”等投机行为盛行。而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大量上市公司资产的长期投资价值相对较低。在此前资本市场的审批制与核准制框架下，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难进难出，只进不出”的特征。

这便造成了，具备高增长型的中小企业“进不来”，投资者“投不到”，而已经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企业“出不去”，投资者“只能炒”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以及北交所设立下，将会有更多处于价值早期，具备快速成长能力的中小企业实现登陆资本市场。因为，从目前北交所的上市条件来看，彻底打开了处在早期的中小企业实现资本化 IPO 的大门。

另一方面，北交所在资本市场退市新规的大框架下，同样使用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 4 套退市指标。北交所企业退市去向的差异化安排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退到创新层和基础层继续交易，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应当直接退出市场。

由此可见，北交所市场，不仅将企业实现 IPO 的大门打开，也将会持续对不良企业加速出清。处于早期的中小企业具备高增长潜力的同时，也具备着较高的经营风险。而北交所的退市制度安排，使得企业退市与退市后再上市的路径更为畅通，融资发展更为高效、便捷。

整体来看，北交所在资产端将会实现更好的“新陈代谢”，留下更多具备投资价值的高增长型中小企业。从而逐步出清资本市场目前投资端“炒小、炒差、炒新、炒壳”等投机行为特征。使得市场实现“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长期发展生态，资金端投资者也将获得更为长期的投资收益。

北交所作为全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将助力中国重大科技创新在细微“毛细血管”中的专精特新企业实现融资发展，从而打通科技创新的“堵点”。

而北交所给市场微观主体的机遇便是：产业端的“专精特新”与资本端的“北交所”，就像 20 年前产业端的“互联网”和资本端的“股权投资市场及纳斯达克”一样，这也将彻底改变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动能与底层逻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来源：爱思想网(2021-10-29)

作者：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共同富裕作出新的阐释：“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进一步揭示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深刻蕴含，彰显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境界和思想智慧。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新时代的赓续和拓新

社会主义本质，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中作出的重要概括。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这一概括完整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凸显了这一本质规定中逻辑紧密、学理相衔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任务；二是突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三是明确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的阐释。2012 年 12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一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整体上，凸显共同富裕是具有“归根结底”意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整体上，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手段，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根本前提，凸显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二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和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双重意义上，凸显共同富裕是具有“奋斗目标”意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结合中，共同富裕由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内涵，跃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赋予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生相随，不仅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上的根本要求。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坚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又强调指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社会对生产条件的分配，根本的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了人们在分配中的地位；而社会既定的分配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决定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分配的“制度安排”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总体上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正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有可能相对合理地处置体制层面上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的，但它不可能解决制度层面上的“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要恰当地处置好体制层面上的“公平”和“效率”关系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好制度层面上的共同富裕本质要求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上看，不能把共同富裕的制度性规定等同于“公平”和“效率”的体制性关系问题；也不能把体制性的“公平”和“效率”关系，同制度性的共同富裕要求对立起来，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体制性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制度性跃升。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的就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紧扣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具有的制度性、体制性的“本质要求”，从“本质要求”上对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和方略性问题作出新的阐释和新的部署。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新发展阶段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对新发展阶段根本目标的深刻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愈加明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目标性规定也更为明显。以“十四五”时期为开端的新发展阶段，一方面使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其中包括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在不断增长，愈加成为秉持人民至上，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美好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作为社会“需求”，是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供给”的。与“需求”的不断增长相比较，“供给”能力和水平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明显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的分析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除了“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这两个突出问题外，其他四个突出问题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解决好这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也是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后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直接涉及“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主要方面。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新发展阶段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向和根本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和有效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以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为聚焦点的，也是形成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发​​展极和着力点的根据和立场。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部署，一是在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阐释中，明确提出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要求；二是在对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要求。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擘画了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战略步骤和进军路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新发展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摆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向着更远的目标谋划共同富裕的目标。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不仅从战略目标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还从发展规划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完备方略，特别是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在对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主要措施上，强调“完

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第二个百年”启程之际，这些部署和措施的提出，凸显了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战略意义和方略举要。

回溯历史、前瞻未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庆祝大会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出新的阐释，特别是对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战略意义和方略举要作出新的阐释，在总体上提出“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的新的推进理念、实现路径和根本方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深邃探索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为圭臬的。在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的概括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凸显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整体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富裕，是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过程的、要分阶段推进和实施的共同富裕，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内涵。

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写真，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美好生活”涉及的需要范围的全面性，包括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方面；二是“美好生活”涉及的需要，在实现方式上的公共性、共享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同“中国式现代化”相同，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和前提的。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把共同富裕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联系，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也将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加强全面领导的基础。在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新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第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有步骤的，具有逐步实现的过程性特征。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共同富裕具有逐步实现的特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要有步骤也要有重点。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有步骤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点。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办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把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放到重要的位置,要坚持把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三,共同富裕具有涵盖“美好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性特征。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在富裕的内涵及其发展中,特别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891年,恩格斯在探索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中人民群众需要满足状况时提到,“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恩格斯提到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总体上涵盖了“美好生活”基本方面,在层级上呈现了“美好生活”的全面性。共同富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为特征的。

第四,共同富裕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为过程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精准的表述。人民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享有建设成果,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共建共治共享共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实现的。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深邃论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对“第二个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形态探索中,提出了两个“全面”的观点:一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这两个“全面”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的概括,深化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意蕴,也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形态认识的视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两个“全面”融于中国社会形态认识之中,创造性地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两个“全面”的重要标识,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特征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在对以往各种社会文明形态特征作概括时指出:“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既在于两个“全面”之“新”上,也在于完全改变了以往社会“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鲜明意向和旗帜之“新”上,由此而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一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向世界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式和中国智慧。

“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体现的两个“全面”的意义,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两个“全面”思想的中国化读解。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索中提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

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这两个“全面”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最崇高的境界，也是我们现在理解共同富裕的全面性的思想来源。把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全面发展同共同富裕相联系，把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同社会发展形态理念相联系，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也是对共同富裕具有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首位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形态演进因素的概述中，就是以“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为序列过程和传导系统的，“需要”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和牵引性的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包含了共同富裕的“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的和牵引性的重要作用。新发展阶段，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牢牢抓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凸显这一过程的特点和作用，结合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系统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将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出发，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深入探索

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第一个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我们逐次从初步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华彩乐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回溯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和“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最突出的成就，既是对百年辉煌的高度凝练，也是对第二个百年砥砺前行的深刻前瞻，

凸显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重大意义，体现了第二个百年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一个百年的伟大成就用“三个光荣”，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作出高度评价；第二个百年的伟大成就必然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也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三个光荣”之所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变、砥砺前行始终坚守的主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之后，就进入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的新的发展历程。1955 年 10 月，在对社会主义改造前景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同志从“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高度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毛泽东同志强调：“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5-496 页）毛泽东同志已经揭示了共同富裕与中国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表达了实现共同富裕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共同富裕问题。1990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邓小平同志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中心课题，作出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概括。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中，江泽民同志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进入 21 世纪，胡锦涛同志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史性跨越中，续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新篇章。2012 年 11 月，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就向世界宣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凸显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对新发展阶段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产生重要的影响。

加强人民币升值情形下的汇率预期管理

来源：财经网(2021-11-04)

作者：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要点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币缺乏汇率弹性，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利差交易货币，埋下了“8.11”汇改初期跨境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隐患。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时释放了市场压力，避免了预期积累，低买高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未来可继续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研究适时扩大乃至取消汇率浮动区间。

在有管理浮动框架下人民币汇率已经越来越灵活

关于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是，没有任何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广义的汇率选择，既包括汇率制度安排，也包括汇率政策操作。其中，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政策则是相对灵活。正如在通胀目标制下，既有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也有中性的货币政策，还有扩张性甚至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同一汇率制度下，也可以有不同的汇率政策。

1994 年初汇率并轨以来，中国一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描述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单一”并非指人民币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因为并轨前是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并轨后境内所有外汇交易都使用市场汇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是汇率政策宣示，而非重归单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2005 年“7.21”汇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2% 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非新的汇率安排，而是重归真正的有管理浮动。将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归于“7.21”汇改，是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误读。

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期实行了不同的汇率政策。2015 年“8.11”汇改之前，通常是当外汇形势好的时候，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步快走、渐进升值：2005 年“7.21”汇改后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前，人民币汇率从 8.1 逐步升到 6.8 附近；2010 年 6 月重启汇改到 2014 年初，又从 6.8 逐步升值 6.0 附近。当外汇形势恶化时，则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或主动收窄汇率波动区间：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至“7.21”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 8.28 左右；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海啸暴发后至 2010 年 6 月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在 6.81 至 6.86 区间窄幅波动。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更加注重灵活性。汇改初期，恰逢中美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指数走高，人民币汇率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经历了阶段性调整，到 2016 年底跌至 7 附近。2018 年之后，又是国内经济下行、对外经贸摩擦，人民币汇率多次跌至 7 附近。2019 年 8 月初，人民币汇率应声破“7”，打开了可上可下的弹性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被称之为“不叫改革的改革”。2020 年，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双向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人民币汇率有管理浮动再次经受了考验。

本轮升值对出口企业财务影响加大引起了政策关注

前述关于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隐含的信息是，任何汇率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浮动汇率制度或灵活汇率政策的好处是，可以平滑短期资本流动、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减少对资本外汇管制的依赖等等。但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汇率超调，即市场汇率相对于经济基本面出现过度升值或过度贬值的情况，并且超调现象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纠正。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美联储高利率反通胀政策导致的美元泡沫就是前车之鉴。美元高估削弱了美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导致美国贸易赤字规模明显增加。这直接触发了 1985 年 9 月，西方五国签署广场协议，实施联合干预。

但这又旋即成为日本人的梦魇。广场协议之后，为应对日元汇率持续大幅升值，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用低利率来抑制海外对日元资产的配置需求，减缓日元汇率的升值。这滋生了日本股市和楼市的资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停滞、金融战败。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依然是有管理浮动，只是政策上更加趋于灵活，央行基本退出了外汇常态干预，更多让汇率发挥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直到 2020 年 5 月底，人民币汇率还创下 2008 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低。但自 2020 年 6 月初起，人民币汇率震荡升值，到 2021 年 6 月底累计升值 10.4%。

这波人民币升值的重要背景是美元指数走弱，许多非美货币兑美元也出现升值，因此，人民币兑主要贸易伙伴的多边汇率升值幅度要明显小于双边汇率。同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口径（China Foreign Exchange Trade System，简称 CFET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仅升值 6.1%。加之国内通胀水平低于海外，同期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则仅上涨了 2.5%。可见，理论上讲，这轮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较多升值，仍然对国内企业造成了较大的财务压力。2021 年上半年，我国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规模仅占外贸进出口额的 14.7%，银行代客涉外外币收付中美元占比则高达 90.1%。这显示我国 85% 以上的跨境贸易是外币计价结算，而外币计价结算中九成以上又是美元。国内出口企业仍然严重暴露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波动的风险之下。

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是 2009 年底从跨境贸易开始的，政策上早已实现了本外币一视同仁。迄今，我国跨境贸易中人民币支付结算占比依然较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外贸发展方式依然比较粗放，且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受制于人。因此，增强外贸企业抵御汇率波动风险能力，需要加快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高非价格竞争力，争取产品定价权。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时隔两年之后，人民币汇率大涨，2020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却重提“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目标。

汇率预期管理要解决“中间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问题

中国除了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带来的汇率超调问题外，从制度层面讲，相对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角点解”，还面临有管理浮动汇率“中间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两大问题。

所谓市场透明度，就是有管理浮动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涨为什么跌。所谓政策公信力，就是官方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人民币汇率依然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贬值，这是不是市场理解和认可的汇率稳定。

央行行长易纲在 2001 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曾经形象地指出，在面临货币攻击的情况下，公众会基于政府放弃已有汇率制度的成本和政策透明度来判断政府承诺的可信性来采取行动。如果可信度高，公众不会恐慌；如果可信度低，公众会抢先抛售本币资产，拉大政府控制的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当政府反向操作的弹药（外汇储备）告罄时，中间汇率制度即崩溃。由此可见，政策公信力事关有管理浮动的可持续性。

“8.11”汇改以后，中国见招拆招，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币汇率遭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问题。

2016 年 2 月，披露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定价公式（即中间价=上一交易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这解决了市场透明度问题。2016 年底，人民币汇率跌至 7 附近，却没有引发新的股汇双杀，因为市场理解，这是美元强导致的人民币弱，而非竞争性贬值。然而，外汇市场依然出现了一定的贬值恐慌，市场激辩保汇率还是保储备。

2017 年 5 月底，宣布在中间价报价公式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更好反映经济基本面对冲外汇市场顺周期行为。结果，在外汇依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借美元指数大跌之际，不仅没有破 7，反而升值 6% 以上。这解决了政策公信力问题。人民币不跌反涨，沉重打击了看空做空人民币的投机势力，也教育了国内企业不要单边押注人民币贬值。2017 年成为中国跨境资金流动从净流出走向基本平衡的转折之年，此后人民币汇率由单边走势转为双向波动。

本轮人民币汇率走强始于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0 月底，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被宣布淡出使用。当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又恢复为只参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两因素。这一报价机制隐含着美元强人民币弱、美元弱人民币强的显性逻辑。

2021 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呈现先涨后跌、再涨再跌的“W”型走势，与美元指数走势基本为镜像关系，表明汇率“中间解”的透明度问题已经解决。但此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仍然会阶段性地面临公信力问题。当美元指数回落趋势较为明显的时候，市场容易形成较强的升值预期，出现追涨杀跌的顺周期行为。人民币汇率维稳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前期的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是及时的、有效的

2021 年 5 月底 6 月初，美元指数重新跌至 90 以下，导致境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一波急涨行情，交易价和中间价先后升破 6.4，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

这波人民币汇率急涨主要是离岸市场主导。5 月 26 至 28 日，离岸人民币（CNH）相对在岸人民币（CNY）持续偏升值方向，差价达到约 100 个基点（约合 1 分钱）。同期，1 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也出现了跳升。

由于国内企业持有较多美元头寸，人民币升值预期带动在岸市场出现外汇抛售。5 月 25 至 27 日，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日均成交量达到 509 亿美元，较 5 月 6 日至 24 日日均成交量高出 20%，较 2020 年 12 月份日均成交量高出 16%。

为加强汇率预期管理，有关部门密集发声并出台多项调控措施。例如，5 月 23 日、27 日，央行两次发表声明，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政策不变，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变，警告坚决打击各种恶意操纵市场、恶意制造单边预期的行为，提醒各方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敦促企业和银行都不要偏离风险中性“炒汇”。

与此同时，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5 月 31 日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6 月 2 日，外汇局宣布一次性向 17 家 QDII 机构合计发放 103 亿美元投资额度，为有史以来批准额度最多的一次。这向市场释放了当局言出必行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强化了汇率预期管理效果。

受汇率预期管理及美元指数反弹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急涨态势迅速结束。6 月份，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中间价累计下跌 1.4%；1 年期 NDF 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从 5 月底的单边升值转向总体偏贬值方向；CNH 相对于 CNY 的日均差价从 5 月 26 至 28 日的负 99 个基点（即偏升值方向）转为正 32 个基点（即偏贬值方向），显示离岸市场做多人民币的力量也迅速退潮。5 月份，境内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虽较上月有较大增加，但较前高仍低了 67%，且低于 2021 年头 2 个月的规模，6 月份顺差进一步环比下降 2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预期管理过程中，监管部门没有引进新的行政管制措施，而只是采取了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并且，中国没有借此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6 月份，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仅下跌 0.2%，上半年累计上涨 3.3%

进一步加强汇率预期管理的政策选择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人民币缺乏汇率弹性，一度成为全球主要利差交易货币，埋下了“8.11”汇改初期跨境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隐患。近年来特别是 2019 年破 7 之后，更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时释放了市场压力，避免了预期积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到 2021 年 3 月底，民间对外净负债 1.16 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 GDP 之比为 7.2%，分别较 2015 年 6 月底（“8.11”汇改前夕）下降了 51% 和 14.6 个百分点。未来可继续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研究适时扩大乃至取消汇率浮动区间。民间货币错配的大幅改善，增强了市场主体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承受力，是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底气所在。

继续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成熟的外汇市场需要成熟的外汇市场参与者。为此，要通过持续的投资教育，引导市场主体增加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平常心，促进市场形成汇率双向波动预期，避免追涨杀跌的羊群效应。引导市场主体立足主业、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加强对货币错配和汇率敞口的管理，避免单边押注汇率升值贬值行情。

拟定汇率波动的应对预案。市场预期管理，既要靠说，也要靠做。任何国家对于非合意的资产价格变动都不会置之不理。如应对 2021 年初的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美联储除了通过“出口术”平息市场紧缩预期外，更是通过无限量宽下每月不少于 800 亿的美债购买操作，稳定了美债收益率，进而稳住了市场预期。为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过度或异常波动，要拟定应对预案、充实政策工具箱，当外汇市场出现极端行情时，适时出手，及时遏制单边预期的形成。当然，如果未来美元指数呈现震荡走势，驱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相关措施未必用得上，但要有备无患。

进一步发展境内外汇市场。近期人民币汇率急涨背后的推手，是市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顺周期羊群效应，暴露了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些短板。因此，建设有深度广度、有流动性的境内外汇市场刻不容缓。例如，可以研究引入风险偏好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参与交易，适时适度放宽实需原则，增加交易产品种类，提升外汇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

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融入金融全球化步伐扩大，要求加快外汇调控方式从传统的行政管制、数量控制，转向宏观审慎措施相结合的市场化方向，增强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议进一步丰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工具箱，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 思考与建议

来源：爱思想网(2021-11-02)

作者：林毅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他还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他号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属于显学，改革开放以后

国内各大学大力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投入的力量最大、师资力量最强、每年招收培养的学生最多，相形之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文论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来自经济学家对其所在国家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或为了解决其所在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在总结经验或为解决突出问题而提出理论时，必须从其所在国家成千上万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以构建因果逻辑，“舍象”其余变量，被“舍象”的变量并非不存在，而是“存而不论”，成为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为这个理论的“状态变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被提出时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

现代经济学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到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英国，那段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总结英国的现象或是针对英国的问题，所以凯恩斯以前的理论，都是“内嵌”于英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都是具有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的理论。这些理论被提出来并在世界上流行，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或问题在世界上会有最大的影响、受到最大的关注，所以说，是英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也都是总结美国的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些理论同样是“内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也是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理论。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成立的前提，那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变量中如果关键的变量发生变化，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由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

第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学。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约翰·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宏观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子学科。凯恩斯主义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结果是“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增加。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现象，其政策措施也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功能。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被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来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刺激都是无效的。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被取代，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当时世界各国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政府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恢复均衡，不存在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暗含前提变化了，政府再采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就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国内热门的话题——产业政策。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 年）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主张并使用了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那时美国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

段，为了追赶工业化的英国，汉密尔顿给予国内制造业关税保护和税收优惠。后来在产业政策理论的确立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 年）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到美国访问、工作时，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主义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回到德国以后，也积极倡导德国采用保护主义来发展工业，认为由此德国才能够从农业国变成制造业强国，追赶上先进的英国。但是，为何现在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跟着附和？原因是条件变了，到了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 and 18 世纪末的英国一样，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也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他们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保护，而且，为了方便他们的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由贸易就取代了保护主义成为美欧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不扶持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基础科研的突破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所以，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从追赶阶段时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倡导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在扶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上则从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等改为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盛行一时以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些所谓的主流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瓶颈、机遇和合适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经济要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就要不断创新、产业就要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居世界最前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自己发明靠自主研究和开发，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是探索如何促进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保罗·罗默还因此获得了 201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和技术同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定义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产业的产品价值比现有产业的产品价值高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产业，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的机会，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自主研发低，在此条件下，引进消化吸收是比自主研发更有效的创新方式。所以，并不是发达国家盛行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

另外，在进行一个国家的增长核算时，在成本方面美欧通行的方法是，只统计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而不统计为获得新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后者的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在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不能用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的剩余。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把这种剩余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此来代表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或产业时，通常是以购买包含有新技术的设备来实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体现在资本量的增加，因此在增长核算中就不会表现为 TFP。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来源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像美国，2/3 的增长来自 TFP，但是，经济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有 3% 左右。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 3 倍，甚至更高，但是 TFP 很低。那么，到底是以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 TFP 但增长率低好，还是引进技术设备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增长率但 TFP 低好？当然发展是硬道理。发达国家如果没有 TFP 就没有技术进步，为了经济增长，就只能自己从事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 TFP 的研发。发展中国家既然有引进低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技术设备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那就不应该有 TFP 崇拜，到了产业技术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时，依靠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成为必要的选择，那时，TFP 也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那么，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要遵循处于追赶阶段的美国、德国，采用汉密尔顿、李斯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就可以？其实也不尽然。因为，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美国、德国和当时世

界最先进的英国的发展差距并不大,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数据,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在1820年时,英国、美国、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706元、1257元、1077元,美国 and 德国分别约为英国的74%和63%,和英国相比资本并不短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先进制造业是具有“轻工业”性质的纺织业和与其相关的设备制造,美国、德国已经具备发展那些产业的资本禀赋条件,也就是已经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所缺的是对先行企业家的外部性补偿和克服制造业发展所必须有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所以,美国、德国政府可以以当时英国的先进制造业为产业政策所要追赶的目标,给企业家提供上述帮助,就能使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迅速从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帮助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这个理论的政策目标及提出的措施和汉密尔顿、李斯特的理论相似。但是,按照结构主义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能够把一些先进制造业建立起来,却普遍遭遇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的现实,最终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像美国、德国那样迅速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同的政策目标和措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推行结构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普遍不到美国的10%,要发展当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要素禀赋的条件不具备,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即使靠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和保护补贴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会因非常没有效率而最终失败。

我最早思考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是1988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1987年我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美国所学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理论认为总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率自然会降下来,而且,只有好的投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差的项目则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我国当时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动利率,而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压低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这种行政手段难免因为信息的缺失而乱点鸳鸯谱,好的项目可能会被砍掉,差的项目被保留,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果真如此不理性,怎么能够在1978—1987年维持了9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一年9%的增长都不容易,何况是9年,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则是难上加难。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必然很理性。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前提条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有大量的违反比较优势、大规模的、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低利率的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亏损增加,为了其生存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带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又将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用低利率来补贴但又不允许其倒闭的企业,所以条件不一样,有效的治理措施也就会不一样。

当发达国家条件变了,适用的理论也就随之改变。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同的条件,那么,如何能期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的条件,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也不能拿他们那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依样画葫芦”。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不能只靠“西天取经”。

不过,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特别有力量,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总可以指出发展中国家这里不对,那里不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容易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是落后的,发达国家做的就是对的,发展中国家不按那样做就是错误的;第二,这些理论一般是理想

条件下的理论, 转型中国家存在很多扭曲, 扭曲有各种代价。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许多问题, 很容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和按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所致。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下, 用发达国家主流的理论作为批判发展中国家落后和扭曲的依据, 也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以获得许多掌声, 也可以迷惑在生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一般群众, 很容易形成社会思潮, 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就容易导致屡屡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

但是, 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成功的例子, 颜色革命的结果也只是使原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为恶化。极少数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追赶阶段的政策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例如, 19 世纪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倡导和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从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发展传统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出口导向政策, 从当时盛行的采用进口替代发展先进的大规模制造业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政策, 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之中,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 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 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 而发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经济学家就必须像 18 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 以及 19 世纪初德国李斯特那样, 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 而是实事求是, 了解自己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 以及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性, 提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 才能使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我国统一起来, 根据这样的努力提出的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 到 2025 年前后应该会跨过人均 GDP 12700 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 15% 增加到 34%, 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有自信来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和为解决自己的新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新理论。同时, 届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和欧美等先进的老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 也只有他们的 1/4 不到, 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出现在我国的问题, 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性的理论来解决, 这样才能实现在 2050 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到 2035 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 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像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一样, 在 21 世纪, 世界经济中心也必然逐渐转移到我国。18 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 我们也应该有实力和自信, 迎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时代机遇, 也是时代责任。

二、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两种可能

的范式：一种是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工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有别于西方主流的新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像我近些年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视角，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新的理论体系。

这两种范式有两个共同点：以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新的理论来自对新现象的总结为解决新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来自对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样提出的理论创新才能内嵌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也才能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其次，马克思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上的运用，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适宜的软硬基础设施也不同，因此，即使面临的问题相同，例如，如何创新技术，如何升级产业，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和制度环境也会不一样。只有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才不会误把发达国家处于其发展阶段和结构特性的理论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来构建理论时，也才会有意识地去深入考察理解自己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特性和这些特性对经济运行的意义，提出的理论才能够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也才能在解决我国的问题上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

反之，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研究的是中国现象，构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现象的本质，解释其“道理、学理、哲理”。例如，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外主流杂志上有不少研究，发表的文章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有中国的经验数据的检验，但是多数发现则是采用西方主流的产权理论的观点，把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理，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80%的GDP是国有企业创造的，现在只剩下25%左右，其他75%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外盛行的产权理论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按此观点可以写成严谨的数理模型来解释我国转型的成功是由于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掌握的大量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所取得的成果。这种理论还认为我国现存不少问题，如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则是由于还没有完全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由此带来的干预扭曲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文章似乎很有说服力，可以在国际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但是这样的文章如果真正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道理和学理，那么，苏联、东欧在转型前和我国一样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按照上述理论苏联和东欧转型后应该发展得比我国好。可是，他们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国则稳定、快速发展；而且，困扰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他们也都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同时，上述理论若真的揭示了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学理，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不仅比重下降，产值的绝对量也应该下降。但是，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和改革开放开始时相比下降了不少，绝对量却增加了10倍。所以，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不在于资源从“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要揭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要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会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以及这种内生性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论才能真正把握现象的本质。以上述我国转型成功为例来说明,由于我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原来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在转型期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并因势利导其发展,我国的经济才不仅维持了稳定,而且取得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符合比较优势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更快速。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我国国力加强,也更有能力投资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产业。可见,我国的国有企业也同样在发展,虽然速度慢于民营企业。

这两种范式的区别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述,还是借鉴现代主流的新古典方法来分析和论述。传统上前者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有利于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则较少;后者侧重于以理性人的视角来分析,有利于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的内生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前者可以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充实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规律的研究;后者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从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切入点,来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决定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内生差异,进而分析这种内生差异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劳动分配、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合适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的规律。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把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时,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平面来分析,只要和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则被认为是扭曲,形象地说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二维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三维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要素禀赋、产业、制度等结构平面。从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的平面向生产力水平高的平面的升级属于发展的问题,从一个有扭曲的平面向没有扭曲的平面的转变属于转型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转型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目标不同,前者以转型到和各自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目标,后者以转型到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为目标。另外,不同平面的经济运行规律也有其各自的特征,例如,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到底是应该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是不同的。

上述两种范式所构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类似于我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宋明理学和禅宗。在我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我国的正宗哲学,但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社会动荡,入世的儒学不能解决世人内心的空虚和对生命终极意义追求的问题,一直到唐朝,按照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说法,知识分子非佛即道,虽然为了考取功名必须研习儒学,但是内心信奉的不是道家的玄学就是佛家的出世哲学。只有到了宋明理学吸收了佛家的心性之学和对人生以及宇宙终极真理的探索,才使得儒学得以复兴,这犹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从生产关系扩充到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则像禅宗,佛教原为外来的出世宗教,和入世的中国本土文化存在巨大冲突。到了唐朝六祖慧能发展了禅宗,吸收了儒家仁的核心精神,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把佛学从出世的关心自己的解脱变成入世的普世关怀,虽然保留了佛学的话语,但是因为吸收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济现象、分析出现在我国的突出问题,因此,类似于禅宗的做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的这两种范式,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对象和指导的原则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沿袭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体系,符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把人民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上来。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方式和国外通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一样,有利于在国内知识界、舆论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竞争,让学习者比较和了解何者能够更好地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统一起来,也有利于在国外传播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经济学学科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学科设置和学科体系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们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极不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需要。

第一个问题,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有14个门类,经济学是其中的一个,经济学门类又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这个设置方式意涵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可以不涉及如何运用于改造世界,应用经济学的作用在于改造世界,不用在认识世界上做出努力。这样的设置方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个不可割裂的过程的看法。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前提则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并且,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实,在教育部公布的14个学科门类当中,只有经济学门类把理论和应用分别设置为一级学科。

第二个问题,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共有16个,其中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和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只有这两个二级学科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特色,仅占16个二级学科中的1/8。这一设置使得各大学在经济学学科的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边缘化。而且,在其他14个二级学科中,只要外国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我国也就没有这样的二级学科设置,以至于有些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没有被列入二级学科。最为明显的就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中都没有把发展经济学设为二级学科。其实在国外发展经济学曾经盛行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指导众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了发展经济学的子学科,许多大学都有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设置。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做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体制和理论来发展和运行其经济就可以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因而式微。在美国除了威廉姆斯学院和范德堡大学之外就没有其他大学专门设置发展经济学的学位项目,受此影响,我国也就没有发展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在我国经济学学科设置中亟须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学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

第三个问题是教材。我国现在各大学经济学学科所用教材基本上不是翻译自英文原版,就是根据英文原版来编写,介绍的是总结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或为解决其突出问题而提出,并内嵌于其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主流理论,这样的理论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内生性,以及存在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以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很有力,但是作为改造世界的武器则经常苍白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我国当前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很不利于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学科设置是指挥棒,各大学的师资、学生和资源按照学科设置来配置,目前具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只是16个二级学科当中的2个,要招聘老师、培养学生都很难。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改变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为此,建议在经济学这一学科门类设置三个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三个一级学科之下再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二级学科。这三个一级学科中,前两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来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后者仍然沿袭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有利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有利于相互之间以其理论体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确立。

新闻快讯

多项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金融标准发布

来源：经济参考网(2021-10-21)

作者：张莫

10月21日下午,《经济参考报》记者从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获悉,一批金融国家标准、金融行业标准等金融科技守正创新成果正式发布。据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标委”)秘书长杨富玉介绍,今年金融标准的发布总量较去年有所提升,与此同时,在发布金融标准范围上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包括金融产品与服务、绿色金融、金融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安全、金融监管、支付清算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首次发布了2项绿色金融行业标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金融标准支撑,助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日前正式发布。《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和推广金融领域科技、产品、服务与基础设施等标准。“今天发布的多项标准是落实《纲要》有关任务的具体体现。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将与人民银行一起,持续推动完善金融业标准体系,将《纲要》部署落实落地。”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李涵表示。

杨富玉在当日举行的媒体交流会上表示,根据国内外金融标准化发展趋势需求,金标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更加开放兼容的标准体系,加快完善金融标准全生命周期科学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标准供给质量和效率。一方面,顺应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技术在金融业应用的发展态势,补齐标准短板,优化金融标准供给;另一方面,加快健全现代化金融标准体系,紧盯金融发展和行业要求亟需的标准,提升金融标准研制和实施的科学化水平。

从数量上看,2021年以来,发布金融国家标准19项,行业标准28项,其中包含1项强制性国家标准,金融标准发布总量较去年有所提升。“其中,金融国家标准发布数量显著增多,包括发布了首个金融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布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更好适应国家标准化改革布局。”杨富玉说。

值得注意的是,金标委将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数字货币、普惠金融、金融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关键性金融标准,强化金融标准有效支持国家战略、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需要。在金融科技方面,加强新技术金融业应用标准研制和实施,引领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在绿色金融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支持经济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

法媒报道： 世界对中国集装箱“依赖程度惊人”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1-10-19)

责编：周晨

参考消息网 10 月 19 日报道 据法国《回声报》网站 10 月 17 日报道，集装箱短缺是海运行业 and 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

今年春季，40 英尺（约合 12 米）干货集装箱——市面上的集装箱大部分是这种——的采购价格超过 6500 美元，一年内价格涨了一倍多，达到自 1998 年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开始监测价格以来的最高水平。冷藏集装箱和罐式集装箱的价格也呈现同样的上升趋势。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租赁企业友诺罐箱公司亚洲区负责人弗朗索瓦·巴蒂说：“在一年的时间里，罐式集装箱的采购单价从 1.3 万美元上升到 2.1 万美元。”

报道称，为了解决“箱柜”短缺问题，中国有关部门早在 7 月就要求国内制造商增加产量。货物运输活动极其依赖中国制造商：中国的干货集装箱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96% 以上，恒温冷藏集装箱产量占比达到 100%，罐式集装箱产量占比超过 90%。

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中国的干货集装箱产量同比增长 235%，达到 300 万个 20 英尺标准箱（TEU）。

友诺罐箱公司的专家指出：“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满了，交货期限也在延长。几个月前，从订购到交付一个罐式集装箱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而现在差不多需要 6 个月，甚至更久。”

报道称，得益于这种强劲的需求，中国中集集团今年上半年集装箱业务实现净利润 43.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9%。该集团干货集装箱销量超过 110 万个 TEU，同比增长近 220%。

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预计，今年新集装箱的产量同比将增加 67%。造成海运混乱的因素不仅仅是集装箱整体短缺，还包括空箱分配不合理——在美国港口，空箱泛滥，但在中国港口，空箱短缺。要纠正这种现象需要时间。

房地产税试点实施启动时间 将由国务院确定

来源：财经网(2021-10-23)

责编：文静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税务总局将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草案），按程序做好试点各项准备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一、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

基地及其上住宅。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地产税的纳税人。非居住用房地产继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执行。

二、国务院制定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办法，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可行的征收管理模式和程序。

三、国务院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统筹考虑深化试点与统一立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情况确定试点地区，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决定授权的试点期限为五年，自国务院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试点过程中，国务院应当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试点情况，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试点实施启动时间由国务院确定。

海外投资者长期看好中国经济

来源：经济参考网(2021-10-20)

作者：傅云威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 4.9%，增速有所回落。这被某些外媒认为是“不合预期”的减速，但这忽略了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大增 9.8% 的重要事实以及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景和大势。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与疫情、汛情、基数抬升等因素有关，这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就业稳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稳定的基本面，国际主流观点依然持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 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较之 IMF 对世界经济 5.9% 的增速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十分亮眼。

在辨析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关系时，桥水（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王沿告诉记者，中国推动改革开放决心未变，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趋势未变，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开放的意愿未变，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未变。外界应当承认和重视这些基本事实。

正是包括而限于上述因素的众多基本条件和发展潜力，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曲线和高质量发展导向，坚定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公司近期鼓励投资者大幅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摩根大通、高盛等机构也表示中国市场值得投资——中国市场“大到无法忽视”。与这类积极判断相伴生的，是华尔街投资中国高涨的热情。

美国晨星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以中国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的美国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所持净资产总额较一年前增长 130 亿美元，至 430 亿美元，同比增幅达 43%。

据 IMF 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2020 年以来中国已吸引约 1800 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入。

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勒歇尔表示，中国一方面加强内部市场建设、改善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这将进一步吸引投资者进入中国，抓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海外投资者所看重的，不仅包括产业体系完备、超大市场容量和完善的治理等中国优势，他们更为重视中国秉持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和坚定实践，因为后者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健康，使之更可预期、更加稳定，而这意味着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收益流。